

选集

通孝集

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选集丛书

目录

杨嘉善



天津人民出版社

到现在，世界上不能说已尽力，这个问题不致说已

求我们认识中国历史，造成现代，就是从青年时代

不是设计我们自己的道路。这就是得要

首先，在青年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究竟怎样

其基本特征，在近代向现代，转变

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选集丛书

费孝通选集

费孝通 编选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6·5印张 5插页 364千字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700

ISBN 7—201—00105—1/C·20

定 价：7.85元



费孝通像

《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选集丛书》

出版说明

为了系统地搜集和整理“五四”以来我国著名社会科学家的代表性著作，向广大读者介绍现代社会科学家在各个学术领域方面的成就，以推动当代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发展，特编辑出版《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选集丛书》。

本丛书的编选原则是：

一、列选的社会科学家，要求是我国现代社会科学各学科或专业的奠基者、开拓者，或是在学术理论研究方面有创见、成就卓著的知名人士。

二、丛书所选收的社会科学家的著作，要求尽可能体现其生平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系有代表性的著作。对其长篇论著一般只节选其中的主要篇章。

三、本丛书初步拟定为五十种。每位社会科学家各编选一集，每集约三十万字。

书中还有介绍本选集内容及特点的前言，以及对作者的生平、学术活动、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进行综合评价的述评或序。

本丛书是由中国南方图书公司和天津人民出版社共同组稿编辑的。

由于编辑水平有限，恳切希望得到各方面人士和广大读者的支持和帮助，共同为积累文化、传播科学理论做出贡献。

自序

天津人民出版社要出版我的社会学方面的文集，并建议由我自选。趁我头脑尚清醒时，让我自己看看过去所发表的文章里有哪些值得重印，并留给后人阅读。在旁人看来，我的学术生涯已接近尾声了。

说实话，我过去没有想到会活到这年纪的。三十年代我应该死而没有死，四十年代人家要我死而没有死，六十年代我想死而没有死。每次没有死都是出于偶然的机遇。多次出死入生，对自己个人的荣辱看得不那么认真了，但是想到身后的事却不能无动于衷。

文章千古事，并非虚语。一个人的思想一旦写下，通过文字的媒介，送入了别人的头脑，也就成了社会事实，发生社会影响，因而有功罪可论。自编文选，总是希望给后人留下一些美好的印象。这就带出了自我评估之意，真难为了我。

我对自己的作品估价是不高的。一九八二年答复为我写传的阿古什先生的信里曾说：“长得不那么好看的人，不大愿意常常照镜子。”对他给我勾画的形象作了如下的自宥：“我这一生所处的时代是个伟大的时代，对每个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又给人很苛刻的条件，象一个严格的老师在考验一个学

生。我到目前为止，取得的分数是不高的。当然我还有不太多的时间，可以争取再增加几分。”说了这话又是五年，究竟增加了几分也很难说。真是“笑我此生多短促，白发垂年犹栖栖。”

说这是个伟大的时代是不错的。我们这个国家从来没有经历过象这几十年那样激烈的变动。重大的社会改革理应在思想领域里引起相应的激荡，孕育一代文章。“一介书生逢盛世”，我多少自觉到不应辜负这个时代。但是主观努力总是抵不过严峻的客观条件，以致到这时候还是不得不自己承认，“分数不高”。

论我得之于社会的投入，应当说是优裕的。象我一样“受过当时正规教育全部过程”的人，在我同辈的青年中屈指可数，比我年轻的几代人就更不用说了。我依靠家庭的支持完成了大学的教育，这笔费用全部是由我母亲从我父亲为数不多的工资里节约出来的。我出国留学是国家公费，实际上是取之于退回的庚子赔款，是人民的血汗。这样的投入跟我其后交给社会的产出看来是很不相称。我总是有一种自责的心情，“应当做得更好一些”。

为自己作估价不可能很客观。我从别人对我的评论中常体会到他们总带着一些原谅我的口气：在这样的条件下能做到这个程度是不太容易的。那不是对作品实有价值作出的评语。其实只是说这个人应当可以写出更好的作品来，但是并没有，原因则推给了客观条件。我固然可以用以安慰自己，但是天下哪有一个杰出的作家不是从重重困难的条件下挣扎出来的？“文章憎命达”，说出了历史的真实。我不够格。

伟大的时代必然会出现伟大的作品，也许正是因为激烈的社会变革为生长在其时的人，提供了平时难于发生的形形色

色、丰富多彩的生活实际，成了一切思想领域里的杰出作品的宝贵泉源。激烈的社会变革同时也一定会给所有的人带来坎坷不平的实际生活。象在急湍中游泳，一路淘汰着顶不住漩涡的人。如果对这些人说，只要水流里没有漩涡，你是能游到终点的，那有什么意思呢！

在自编文选的过程中，除了“愧赧对旧作”之外，也有得到聊以自慰的一面。我想不到还能在临近终点时有几年的时间在学术跑道上作出最后的冲刺。我猜不透老天的用意，但必须老实说，这机会是得之意外的。

社会学在中国是一九五二年中断的，到一九七九年才重建。我是在一九五七年被打入另册，到一九八〇年才正式“改正”，重被别人作为正常的人对待。在这样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在时代的急流里抬不起头来。更可怕的是失去了精神支柱，对自己矢志要在这生中追求的目标从模糊直到幻灭。“士不可以夺志”，而我的志被夺走了。从四面八方来的，年复一年对我过去所写的文章的批判，使我丧失了对自己的信心。起初不得不“向人民伏罪”，随后也确是觉得“毒草害人，罪该万死”，甚至也学会了用别人批判我的词汇和逻辑去批判别人。哀莫大于心死。这场“触及灵魂的革命”真的挫伤了一个人的心。似梦如魔地过了不明不白的二十年。如果不是在历史上发生了“拨乱反正”这一大转折，我一定会象我许多老师和朋友一样在莫明其妙或全盘否定了自己的心情中离开这个世界。我怎么会活着过来的呢？自己也说不明白。我厌恶我自己这二十多年的生活和言行，除了在梦里，还常常来干扰我，我再也不愿回想这段情节了。我想把这一切推出记忆的范围之外。说我懦弱无能也好，说我宽容大量也好，事实上我连电视屏幕上

的悲剧都看不下去。看来是创伤难愈，余悸犹存。

无论如何，二十多年的阴影我是把它埋在心底里了。在这本文选里，读者可以看到我最后几年冲刺的面貌。人的心理原本是复杂的，多面的，矛盾的。在这段时间里有一点看来占了上风，那就是我下定决心，要用最后的十年追回失去的二十年。身子是过得有点紧张，但我不能再辜负生命的最后一段了。人称晚节，我叫它最后的机会，是表白自己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的最后机会，是回偿一生得之于亲人，得之于社会的最后机会。我的确自觉地深深爱惜这得之匪易的机会，难是难在挥之即去的学术工作却不能呼之即来。我心里希望还能在这几年里多得几分，事实上怎样就很难说了。在人家眼里我是已快来到尽头的人了，是自编文选的时候了。“芳草茵茵年年绿，往事重重阵阵烟。皓首低徊有所思，纸尽才疏诗半篇。”

我一生的学历已附入这本选集，毋须在这里多说。但是便于读者理解我个人学术上发展的经过，不妨让我自己勾画出一个轮廓：我的行文格调二十年代末已经形成，为学方法三十年代中期已经奠定，基本概念三十年代后期到四十年代前期大体建立。四十年代后期是写作上第一个丰收期，对当时中国的知识界有一定影响。五十年代早期是“学习适应新社会”的时期，看来没有学好，从后期起到七十年代末只能说是个可悲的空白。八十年代重新投入学术工作，写作上出现了第二个丰收期，在行文格调、为学方法、基本概念上则只能说是得到了继续和展开，并没有什么新的突破。但是通过这几年的工作，由于坚持立论不脱离实际，有些论点在历史的实践中得到了证实，有些论点也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总的说来，可以说是进入了实用阶段，因而它的价值也容易得到由实践检验的机

会，为社会所接受，使自己有所自慰。如果天假以年，我还能活到九十年代，有一段写“余笔”的时间，通过多读些别人的著作，细嚼此生的经历，是否还能突破早年的格局，那就得由后人去评论了。

要理解一个人思想的来龙去脉，必须有个全局观点，要在这个人的全部著作中去寻找。而我这本《选集》却不仅只是从过去已发表的文章中挑出来的一部分，而且人为地加上了一个《社会学》的框框。在天津人民出版社约定出版这本《选集》之前，民族出版社已先人一步，编定了一本我的《民族研究文集》。我所进行的民族研究和在边区开发这个课题下所写的文章，按我的学科分类也应当属于社会学的范围。这一部分有关中国少数民族的社会学的文章既然抽了出去，就不能再在这本《选集》里占用篇幅了。这是应当在这里声明的。

我一向不主张用学科的框架来限制自己向实际的探索。我认定我这一生的目标是了解中国的社会。这个目标固然具体，但中国之大，历史之久，如何下手呢？我相信科学研究必须有可靠的资料为根据，最可靠的资料是出自自己的观察，所以一开始就着重实地调查。研究社会，就得观察人的生活。到哪里去观察呢？我认为应当从基层入手。在中国就是到由许多家庭组成的农村里去全面观察农民的生活。要正确地认识中国，必须首先认识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这种看法奠定了我以农民为基本对象和以社会调查为基本方法的研究方向。当然，只看到农民，还是不能全面了解中国社会的，但认识全局只有从局部开始。我在前期只调查了农村，到八十年代上升到小城镇，还没有跨出农民的大范围，所以离开了解中国社会的全貌还远。一代不成则继以二代、三代，这样去做研究工作看来比

较扎实些。

这本《选集》内容的排列没有完全按文章发表的前后，而是分题处理。先交代清楚我对社会学这门学科的看法和这门学科在中国的遭遇。其次是提出我在四十年代前期对于农村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认识，然后进入我以江村为主的农村调查。接着从农村调查基础上引出小城镇调查。我另一个超出农村调查范围的研究课题是知识分子问题。以上三部分都用一九八四年我在中国民主同盟开办的暑期多学科讲座所讲的《社会调查自白》中有关章节作为引导。最后一部分是我在几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有关家庭问题的讲话。

我历来发表在各种报纸和刊物的作品包括不进学术文章范围的还有不少。我从十四岁起就喜好写作。第一篇得到发表机会的是《少年》杂志一九二四年第一期“少年文艺”栏里的“秀才先生的恶作剧”。从此我的写作并没有长期间断过，就是在那可憎的二十年里，我还是经常要写“交代”，写“思想汇报”，写批判别人的大字报。实在不能写作时，我就翻译，没有搁过笔。用传统的话来说是作了一生的孽。作孽是欠债，今生偿不了，来生还要清算。这次自编选集，我把旧帐翻阅了一遍。编完了之后，似乎卸下了一些包袱，有一种轻松之感。让我引用《江村经济》自题诗里的一联：“毁誉在人口，沉浮意自扬”，作为这篇文章的结束。

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四日

学 历 简 述

我姓费名孝通，除少年时期写作外，一向不用字号和笔名。江苏省吴江县人。1910年11月2日出生于该县县城。汉族。政治面貌是爱国民主人士，1945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

我早年从蒙养院（即今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研究院到留学得博士学位——受过当时正规教育的全部过程，经过按季按年的考试，逐级循序地熬过来的。

我出生在一个重视学校教育的家庭。我父亲曾是由吴江县以公费送到日本去学教育的留学生。返国后即提倡新学，在吴江县城开办第一个中学，我母亲创办了蒙养院。这些在清末民初是开风气之先的新事物。大约四岁，我就在这所蒙养院里开始接受正规教育。

六岁入吴江县城的第一小学，俗名雷震殿小学，因为利用这个庙宇作校舍的。这个小学曾培养出一些人才，现在北京大学的著名生物学家沈同教授，就是其中之一。我在小学里常因病缺课，成绩不好，没有毕业。于1920年随家迁居苏州城。由于体弱，我母亲怕我在学校里受同学们的欺侮，把我送到她的友人王季玉女士主办的振华女校（今苏州市第十中学）里去附读，一直读完初中一年。在二十年代，我们国内确有许多热心

教育的人，开办私学。王季玉女士是留美的生物学家，继承她母亲的事业，主持这个女校，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岗位，直到终年，是值得我们敬爱的人。这个学校在苏州是有名的。现在我国著名的女物理学家何怡贞、何泽慧姊妹、作家杨绛，就是我在振华女校时的上下两班的同学。由于我在女校不能上大学，入医转入东吴大学附属一中。1928年高中毕业后升东吴留，1923年预科，想学成个医生，为人治病。

读完了两年医预科，我的思想有了改变。那是受当时革命思想的影响，我决定不再继续学医，而去学社会科学。我当时想学好医也只能治一人之病，学好社会科学才能治万人之病。于是我没有像其他医预科的同学一样去投考协和，而转学到燕京大学，而且进了社会学系。1930年秋季我离开家乡来到北平。

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并不能满足我的愿望。在课堂上，很少讲到中国的社会。到了快毕业的那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派克到燕京大学来讲学。我们听到他讲怎样在都市里实地调查，于是我们班上的同学如杨庆堃、林耀华、黄迪、廖太初等就开始商量要用同样方法去研究中国社会。同时我们了解到这种研究方法是从社会人类学里学来的，我就想去学人类学。1933年我在燕京大学毕业后，在老师吴文藻教授支持下，考入清华大学，在社会学及人类学系当研究生，跟一位名叫史禄国的俄籍教授学人类学。这位导师来自欧洲大陆，他所谓的人类学范围包括得很广。他为我订出了个六年计划，分三个阶段：一是学体质人类学，二是学语言学，三是学民族学。他打算收我这个徒弟，要我从头学起。由于我有医预科的基础，所以还能跟得上补习动物学、解剖学和人体测量学。1935年我学完第一阶段，写了两篇论文：一篇是根据一个日本体质人类学

者所发表的朝鲜人的人体测量资料，进行分析朝鲜人的体质类型；一篇是用我自己在北京监狱及北京某部队里得到的人体测量资料，分析中国人的体质类型。这两篇论文没有出版，不知道清华大学是否还保存。体质人类学在中国是一门没有机会发展的学科。这些初步尝试，如果还没有毁掉的话，将来有人类学这门学科时还是可以参考的。

1935年由于史禄国教授要出国休假，而且休假之后他也不准备再回清华，所以他主张在我的学习计划第一阶段告一段落，即提出论文要求毕业考试。如果我考试成绩符合清华资送出国深造的条件，后两个阶段的学习可以在国外补足。我听他的话，取得了公费留学的机会。他又为我出了个主意，就是在出国前到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一次实地调查，然后携带调查资料到国外去分析研究。1935年暑假我又遵照他的指导，偕同我新婚的爱人王同惠前往广西大瑶山（今金秀瑶族自治县）进行调查。我主要是进行人体测量，她调查社会情况。是年12月16日，在我们转移调查地点时迷失道路，我误踏虎阱，腰腿受伤；我妻出外觅援，溺水身亡。后来我遇救背回村寨，一尸一伤由瑶族同胞护送出山。我这次调查所得到的人体测量资料，经久没有分析，带出国又带回来，最后在1946年李、闻事件中仓促离滇时，遗失在云南，是一大损失。我在广州治伤期间，根据我妻的调查资料，编成《花蓝瑶社会组织》一报告，1936年在商务出版，1988年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重版。

我伤愈后，回家乡一个农村里休养，利用这机会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1936年夏携带这项调查资料去英国留学，入伦敦经济学院，在马林诺斯基教授指导下学习社会人类学，并根据农村调查的资料写了一篇论文，1938年得伦敦大学博士学位。

这篇论文1939年在伦敦 Routledge 书局出版，书名 Peasant Life in China，中文名《江村经济》。这书后来流传颇广，曾被国外的许多大学的社会人类学系列为学生必读参考书之一。因为这个缘故，我后来尽管和国外学术界隔离了几十年，新一代各国社会人类学者大多还知道我这个人，近年来我重又在国外出现时，他们对我也分外亲热。该书托友人译成中文，1987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1938年暑假，从英国返国，沿海诸省均已沦陷。我从西贡登陆，径入云南。这时吴文藻先生已先我到达昆明，并在云南大学开办社会学系。我即在该系担任教授，接受中英庚款资助在内地农村开展社会调查，并在云大成立与燕京大学协作的社会学研究室。参加研究室工作的前后有张之毅、史国衡、谷苞、田汝康、李有义、胡庆钧等同志。我们采取社会人类学的实地调查方法，研究农村、工厂、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出版了调查报告若干种，我自己写的是《禄村农田》。

1943年美国以同盟国的身分邀请中国各大学派遣教授赴美访问。云南大学派我应邀。这是我初访美国，时历一载，由太平洋学会资助，编译云大社会学研究室研究成果。在芝加哥大学得到雷德斐尔德夫人的协助编译成 Earthbound China 一书，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中文版称《云南三村》，1988年将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又在哈佛大学得到梅岳教授指导编译成 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 一书，均在美出版。

访美归来，国内政局日趋紧张。我忧心国事，1945年由潘光旦先生介绍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投身爱国民主运动。同时，转入西南联大，为清华大学教授。1946年因李、闻事件被迫离滇，并于该年冬重访英伦。1947年回返北平，继续在清华任教，

直到解放。在这段时期里在学术工作方面，主要是整理讲稿，有1948年出版的《生育制度》、《乡土中国》等，翻译方面有马林诺斯基的《文化论》、斐斯的《人文类型》、梅岳的《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等。此外还写了许多结合时事的文章在国内各刊物发表，收集成小册子出版的有《初访美国》、《重访英伦》、《内地农村》、《乡土重建》、《美国人的性格》、《皇权和绅权》、《民主、宪法、人权》等。其中一部分文章，曾于1949年在北平口授雷德斐尔德夫人，她回国后编成China's Gentry一书，1952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中国成立后，我于1950年起参加国内的民族工作。曾随同中央访问团在贵州和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访问和调查。1952年调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1955年到贵州进行民族识别，1956年参加人大常委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到云南进行工作。这段时期行政组织任务较重，写作不多。成书出版的有《我这一年》、《大学的改造》、《兄弟民族在贵州》、《话说呼伦贝尔》。

1957年在反右斗争中我被错划为右派。1959年摘帽后，配合当时中印、中阿、中巴划界工作，从事搜集有关地区的民族、地理等英文资料，供有关部门参考，后来编成八册《资料汇编》，历经浩劫，近年来经吴泽霖先生译成中文，但尚未出版。

1966年起十年浩劫中，我首当其冲。经历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知识分子迫害的全部过程，住牛棚、上干校，1972年回到中央民族学院，才重握笔杆，从事翻译。我和吴文藻、谢冰心诸前辈一起翻译了两部世界史。其一是我在大学里的课本、海斯及穆恩著的《世界史》，一是我平生很爱读的韦尔斯的《世界史纲》。均已由三联出版。

1978年我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原有意集中力量搞民族研究。是年，我参加了庆祝宁夏和广西两个民族自治区的纪念活动，又重访金秀瑶山，提高了我对民族研究的兴趣。我在政协民族组的一次关于民族识别问题的发言里也流露了我当时想进行调查的线索。11月去日本京都参加联合国大学召开的东亚学者的学术讨论会，我的发言的题目是“对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改革的体会”。

1979年春节后不久，社会科学院胡乔木同志给我们提出了重建中国社会学的任务，而且要我把工作重点转移到这个新任务上。这自然是我义不容辞的事。想到五十年前决心学社会学以来所走的道路是够崎岖曲折的了。现在有此机会为实现早年宿愿又怎能不全力以赴呢？而且我一向认为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是不应当分的，它们都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学科，在国外之所以分成两门学科，实在是出于它们特殊的历史原因，在我们中国没有分科的必要。在我个人来说，我所想进行的民族研究也就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学的研究。我接受新任务并不是改行，只是因为社会学停顿了三十年，现在要重建这门学科，就必须从头做起，培养新一代，那就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要培训教员，要编教材，要筹备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这里有大量的行政组织工作。我原本打算自己去搞几项研究的设想一时落空了。当时我年纪已快到七十，再花几年在这一类的工作上，这一辈子可能也就谈不上实地调查了。

为了重建社会学，我1979年春季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去美国访问，去了解国外社会学的情况。访问回来我写了一本《访美掠影》，这固然是一本通俗的旅游笔记，但目的是在为美国社会作一速写，并通过这种尝试使一般读者接触到社会

学的分析方法。是年秋季又去访问加拿大，利用该国麦吉尔大学邀请我作柯明斯演讲的机会，从东到西地访问了十个重点大学，接触了该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者。我这次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的现代化和少数民族”。1980年春，我参加在美国丹佛召开的应用人类学会年会，在这次年会上我接受该会的马林诺斯基纪念奖，为此我宣读了《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的讲话。在这篇讲话里，我发表了我对社会人类学发展前景的意见。我这些讲话并不能说是专题性的研究论文，而是介绍我们新中国在民族研究方面的成果和对今后发展的看法。

这几年我在国内主要参予重建社会学的具体工作。1979年成立社会学研究会，目的是在社会学恢复名誉，并联系过去学过社会学和愿意参加重建社会学的人。在成立大会上我发表了“为社会学再说几句话”，我被选为该会会长。1980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社会学研究所，我被任命为该所所长。我们在该年暑期开办了为期两个月的讲习班，帮助各大学在1981年开办社会学课程，准备教员及教材，所编《社会学概论》于1983年出版。为了广泛宣传社会学的应用价值，我在全国机械学会召开的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讲了“社会学和企业管理”，在中国心理学会医学心理学进修班上讲了《与精神病医师谈社会学》，目的在促进各应用学科间的协作。

重建社会学的工作告一段落后，我即投入实地社会调查。一方面继续在江村追踪观察，1981年写出《三访江村》，1985年写出《九访江村》。接着准备编写《江村五十年》一书。另一方面在农村调查基础上升入小城镇调查，希望逐级攀登，搞清楚中国的城乡网络。1983年在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讨论会上作了《小城镇·大问题》的讲话。该项课题从吴江一个县做起，扩